

引用格式:王茗盟,翁时秀.知识赋能和参与障碍:研学旅游的社区参与困境及出路[J].旅游学刊,2026,41(2):61-78.[WANG Mingmeng,WENG Shixiu. Knowledge-based capabilities and participation limitations: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tourism [J]. *Tourism Tribune*, 2026, 41(2): 61-78.]

知识赋能和参与障碍:研学旅游的社区参与困境及出路

王茗盟,翁时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研学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结合为乡村居民提供了社区参与新路径,探究社区参与研学旅游所需的能力、意愿及参与障碍是优化参与路径的关键。文章以广东丹霞山周边社区为例开展的定性研究发现:1)按知识获取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可将研学参与群体划分为积极参与者、策略选择者、潜在转化者及无意无力者;2)4类群体知识获取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其研学参与能力、意愿和行为不断分化;3)有限的市场规模与先发优势强化了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制度支持缺位导致研学外围群体的知识接收链断裂,生计转型动力不足与认知心理障碍进一步阻碍了参与深度。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障碍可能导致研学旅游从“增加均衡发展机遇”转化为“收益分化加速器”,需通过政策创新、资源分配改革及支持体系建设进行应对。

[关键词]研学旅游;知识传递;社区参与;参与障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6)02-0061-18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6.02.010

0 引言

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研究中的经典话题。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存在一系列文化障碍、结构障碍和操作障碍,旅游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公平而有序的社区参与^[1-2],而不同类型的旅游形式也对乡村居民

参与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3]。因此,在旅游形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分类探究乡村居民参与旅游所需的能力、参与意愿、参与结果及实现合理参与的有效路径是深化社区参与研究有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研学旅游作为近年来迅速兴起的一种旅游形式,不少地方将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尝试通过旅游产品的创新与拓展,为本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提供更加多样的机会。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科研成果,丹霞山迅速实现了专业研学产品的开发,通过开设科普研学课堂、培育本地研学导师等手段拓宽了社区参与的渠道和方式,目的地在保持观光旅游主导地位的同时,实现了旅游产品多样化,也为乡村人才培育和服务能力提升、生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新路径。

然而,由于乡村社区内部存在异质性,与其他旅游形式一样,研学旅游对不同村民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必然存在差异,甚至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和能力分化的马太效应。例如丹霞山尽管在促进乡村居民参与研学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管理部门在促进居民参与的制度设计、知识赋能、信息传递等方面也走出了足具典范意义的路径,但目前也开始出现本地居民参与科普服务比例较低、参与群体逐步固化等问题,其中隐含的村民参与困境值得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接受已有相关研究的基本结论:与一般的旅游参与不同,社区居民参与研学讲解、担任研学导师等的关键在于拥有相关的科普知识和讲解技能,知识传递是赋能社区参与的主要机制^[4-9],进而尝试回答如下问题。1)知识传递对哪些群体进行了赋能,即哪些居民群体能够参与研学旅游并获得收益。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探析研学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社区参与机会,是让原本就处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群体进一步获益,还是让一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脱贫地区返贫风险的识别与防范”(42371243)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to WENG Shixiu) (No. 42371243).]

[收稿日期]2025-02-12; **[修订日期]**2025-03-22

[作者简介]王茗盟(2000—),女,云南怒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E-mail:wangmm28@alumni.sysu.edu.cn;翁时秀(1984—),男,浙江瑞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旅游规划,E-mail:wengshx8@mail.sysu.edu.cn,通讯作者。

些新的群体获得更多收益从而让旅游收益分配更加均衡。2)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获取路径及其变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解答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发现群体分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3)对有意参与研学旅游但未能实现有效参与的群体,其参与的主要障碍何在。这一问题将为未来探索更具普惠性、包容性的参与机制和社区参与研学旅游的模式优化提供基础。

据此,本研究将依据定性研究的逻辑,以广东丹霞山社区居民参与研学旅游为例,将知识传递作为轴线,围绕知识赋能和参与障碍,首先提炼有意义的社区居民分类维度并建立类型谱系,进而识别知识传递对各类群体的赋能方式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探索研学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困境,并初步讨论可能的出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基于以上研究目标,同时考虑到研学旅游所带来的食宿接待机会和社区参与方式跟一般旅游并无差别,因此,本文将“研学旅游的社区参与”(以下简称“研学参与”)界定为社区居民以旅游产品或文化创意产品的创造者、研学旅游组织者、领队、研学导师、讲解员等角色实际参与研学旅游的行为,并将研学旅游食宿接待等参与方式排除在外。

1 相关研究述评

知识赋能本质上是针对特定群体,将其进行特定活动所需的有用知识传递给这些群体的过程。因此,知识赋能的核心是知识传递,即一个行为者(如个人、团队或组织)通过适当的传递路径,将知识传递给另一个行为者的过程^[10-12]。

已有研究对知识传递过程的刻画方法多样,其中,有部分学者通过量化的方法描述知识传递过程,如结合社会网络理论,运用复杂网络拓扑模型分析知识传递的网络特征^[13-17]。然而,量化方法易简化传递流程,难以深入描述知识传递情境及互动过程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理解知识传递的情境化特征,相关学者从知识类型转化、知识传递阶段等角度提出了若干分析框架。其中,Nonaka的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和内部化(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internalization, SECI)螺旋模型强调知识传递中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动态转化过程^[18], Gilbert和Cordey-Heyes提出包含获取、沟通、应用、接受、同化5个阶段的知识传递模式^[19], Szulanski提出了启动、执行、蔓延和整合的知识传递阶段^[20]。尽

管这些框架基于时序对知识传递和知识内化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描述,但在细化分析个体间知识传递路径差异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Albino等^[11]提出的知识传递要素分析框架则将知识传递过程分解为知识传递行为者(知识源、知识接收者)、知识内容、知识传递情境、传递介质4个关键要素,刻画出知识传递的结构,有助于分析和理解各主体之间知识传递的构成与特征。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运用此框架对目的地知识传递的阶段性变化展开深入探索^[7,11,21-22]。

上述关于知识传递的研究,为本文探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知识赋能提供了研究支撑。在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知识获取通常有多种路径^[23]。基于Albino等提出的框架可以发现,从知识源角度来看,专家学者^[24-25]、外来经营者、游客群体等外部行动者都有可能成为向本地居民传递知识的重要源头^[22,26-28]。同时有研究认为,在旅游地场景中,游客是不容忽视的知识传递来源之一。游客与地方居民在空间内发生非组织性、非计划性的知识互动与知识传递,主体之间的知识差异让地方居民从中收获旅游发展认知、产品开发策略、生态环境意识等知识,影响居民对旅游的理解^[26,28]。除此之外,旅游相关机构与专家通过研究项目合作的模式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并在进行知识整合与应用的过程中,完成专业知识传递^[24-25];外来经营者及小微企业则更多依赖乡村嵌入性合作关系网络,实现经验实践知识向乡村内部的转移^[29-30];政府则更多发挥调控作用,通过运营知识传递“类组织”系统,克服知识传递中的失衡问题,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促进隐性知识的有效转移^[5,27]。具体到研学旅游目的地,已有研究指出,相关机构及高校专家仍是核心知识源,对社区居民的知识获取产生重要影响^[9,22]。但在研学旅游的情境下,游客作为一种知识源的重要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而在知识接收端,已有研究大多聚焦社区中的精英群体^[22]、旅游相关从业居民^[5-7,30],将其视为主要的知识接收对象,或将社区居民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考量,探究知识传递的过程。

综上,尽管现有研究已涉及多种知识传递途径,并为分析不同知识源的传递特征提供研究基础,但这些传递路径通常并行发生且相互影响,而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单一知识传递路径的分析,未能全面揭示乡村旅游地知识传递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借鉴乡村旅游社区内部异质性^[2,31-34]的研究思路,深入探索知识赋能与研学参与过程中潜

在知识接收群体的差异和路径分化。换言之,可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社区,而非集中在特定群体(如知识精英),并通过合适的分类策略,深入探讨不同群体间参与过程、程度和路径差异,进而揭示知识传递中社区居民的动态分化与参与障碍的形成机制。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案例是广东丹霞山景区周边的乡村社区。丹霞山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是“丹霞地貌”命名地,自1928年冯景兰将构成丹霞山的一套红色岩系命名为“丹霞层”以来,国内学者对丹霞山的自然地理和人类活动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1988年开发旅游之后,丹霞山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04年2月13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1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在旅游发展方面,丹霞山逐渐形成了以观光旅游为主导、多种旅游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周边乡村社区,如瑶塘村、断石村,也形成了以食宿接待和农副产品销售为主的旅游参与方式。近年来,依托遗产价值和研究积累,丹霞山加大科普和研学旅游开发力度,成为了广受认可的研学旅游典范。

自丹霞山开发旅游以来,笔者所在团队对其旅游发展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围绕本文研究问题,研究团队于2023年8月22—29日对丹霞山周边的瑶塘村(瑶塘老村、瑶塘新村)、断石村、夏富古村、牛鼻村等多个旅游村落展开了专项调查,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研学旅游参与程度相对较高的瑶塘村与断石村。在整理和分析本次调查资料后,研究团队又于2024年6月12—22日开展了第二次调查。两次调查共访谈48人,并对其中8名核心访谈对象(包含本地研学导师、研学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多次深度访谈,正式访谈人次数共计57人次。

研究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收集一手资料,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目的性抽样法,接触了丹霞山管委会工作人员、研学组织工作人员、高校专家、参与研学旅游的本地居民、未参与研学旅游的本地居民以及外来人员等核心受访者,其中,本地居民主要来自研学旅游参与度较高的断石村与瑶塘村。研究遵循“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

对访谈样本数量进行合理估计,并通过多源信息的三角互证,确保信息可信且有效。2023年8月的调查重点关注研学旅游发展与居民参与整体现状,该阶段完成了共计26人次的半结构访谈。2024年6月的调查重点关注丹霞山科普研学工作者培养路径、科普相关知识传递过程、本地居民研学参与的分化及态度等,完成共计31人次的半结构访谈,每次访谈时长为30~120分钟(表1),深入探索不同主体在参与研学旅游过程中的角色、体验及复杂影响。此外,访谈还涵盖了受访者对丹霞山研学旅游发展的观察和评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地居民是乡村旅游发展与社区赋能的直接受益主体,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本地居民均是户籍在丹霞山周边村庄且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本文对受访者的编码方式如下:管委会工作人员被编码为“GWH+访谈序号”,研学组织相关人员被编码为“YXZZ+访谈序号”,高校专家被编码为“GXZJ+访谈序号”,参与科普研学的本地居民被编码为“YXJM+访谈序号”,未参与科普研学的本地居民被编码为“QTJM+访谈序号”,外来人口被编码为“WLRK+访谈序号”。

3 知识赋能过程中接收者的分化

3.1 案例地知识传递过程及社区外部行动者

在丹霞山旅游发展研究中,已有学者对丹霞山研学旅游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将知识精英成长过程划分为探索时期(2004—2010年)、转型期(2010—2016年)、发展期(2016年至今)^[9],将知识传递过程分为自发性阶段(2003—2009年)、常态化阶段(2010—2018年)、制度化阶段(2019年至今)^[22],这些划分为本文的阶段划分提供了参考。然而,由于本文以社区参与研学旅游为特定视角展开分析,应关注几个推动参与转型的关键节点,因此,文中对丹霞山研学旅游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行了调整与完善,将其大致分为3个阶段。

探索积累阶段(2014年以前):丹霞山拥有百年研究史,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2004年,丹霞山被评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其地质科学价值得到国际认可;2010年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其自然生态景观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在此阶段,专业科考人员及部分村民与专家的持续接触、互动为研学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

繁荣发展阶段(2014—2019年):2014年丹霞山启动“科普志愿者训练营”,知识传递过程逐渐多样

表1 访谈样本信息
Tab. 1 Interview sample information

访谈编号 Interview ID	性别 Gender	角色 Role	研学旅游参与情况 Education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从事行业 Employment sector	访谈编号 Interview ID	性别 Gender	角色 Role	研学旅游参与情况 Education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从事行业 Employment sector
GWH01	女	管委会工作人员	参与	政府	WLRK06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GXZJ01	男	高校专家	参与	高校	WLRK07	女	外来人口	未参与	其他
GXZJ02	男	高校专家	参与	高校	WLRK08	女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1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09	女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2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10	女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3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11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其他
QTJM04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12	男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05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其他	WLRK13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6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其他	WLRK14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7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15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8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WLRK16	女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QTJM09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餐饮	WLRK17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0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其他	WLRK18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1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餐饮	WLRK19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2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餐饮	WLRK20	男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3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1	男	本地居民 (政治精英)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4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2	男	本地居民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5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3	女	本地居民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6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4	男	本地居民 (政治精英)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7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5	男	本地居民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8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6	男	本地居民 (文化精英)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19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JM07	男	本地居民 (政治精英)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QTJM20	女	本地居民	未参与	民宿	YXZZ01	男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自然学校工作人员
QTJM21	男	本地居民	未参与	其他	YXZZ02	男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研学机构负责人
WLRK01	男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YXZZ03	男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自然教育(涵研学导师培养)、民宿
WLRK02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民宿	YXZZ04	男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自然学校工作人员
WLRK03	男	外来人口	未参与	餐饮	YXZZ05	男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自然教育(涵研学导师培养)、民宿
WLRK04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YXZZ06	女	研学组织人员	参与	自然学校工作人员
WLRK05	女	外来人口	参与	科普研学、民宿					

化和专门化,2015年丹霞山被正式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开启发展转型新篇章。随后,管委会通过与高校合作,依托线上社群建设、定期专题讲座及专家-居民互动机制,实现知识传播从辅助科研向日常化深度交流的转型。其间,在外来力量的帮助下,丹霞山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学旅游品牌。2019年推出“科普达人”“科普学堂”,部分村民开始参与研

学旅游活动,知识由外向内传递的趋势愈加显著。

发展调整阶段(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期间,丹霞山线下旅游活动受阻,市场陷入停滞,线上交流却在此期间逐渐活跃;此后线下市场在波动中复苏,居民参与积极性回升,研学旅游市场步入发展调整阶段。对丹霞山自身,研学市场在疫情冲击下亟待转型升级,引发了一系列研学产品的创新,科

普研学活动也逐渐走向规范化。2022年,管委会开始推行更为制度化和标准化的“丹霞山科普研学(自然教育)导师”(以下称“研学导师”)考核制度,构建了以社区服务为核心、制度建设为支撑^[22]的研学旅游发展模式。

依据 Albino 等^[11]的分析框架,识别知识传递过程中的传递行为者是搭建知识传递机制框架和分析知识传递过程的核心。现有研究基本厘清了丹霞山外部知识传递行动者的构成^[9,22],识别出高校专家、研学组织以及管委会等3类关键外部推动者。基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将3类外部行动者的作用概括如下。1)高校专家通过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将专业的自然科学知识、生态保护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当地,持续挖掘丹霞山科学价值,为研学旅游发展提供研究和理论支撑。同时,这些专家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还参与研学旅游的课程设计与指导,帮助居民提升技能、理解研学旅游的价值,并提供科学知识的应用实践机会。2)研学组织是科学知识及研学产品知识转化的桥梁,将科学知识转化为适合地方实际需求的培训项目和研学课程,传授导游技巧、旅游服务标准以及生态保护实践。在管委会的组织下,研学组织提供系统化培训,为居民提供知识获取的渠道,并通过研学项目帮助居民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逐步提升居民参与能力。3)与已有研究不同^[22],本文认为,管委会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推动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外部知识源。管委会兼具政策制定与执行双重角色,借助政策引导及经济激励手段,促进知识传递的有效实施,保障居民参与研学的路径畅通。通过政策衔接、资源管理及与外部学术及商业机构的合作,搭建研学参与平台,确保知识传递的持续性和系统性。更重要的是,管委会通过建立导师认证体系和培训评价机制,构建制度知识体系,规范研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助力居民在研学旅游中完成角色转型。

3.2 知识接收者的类型识别及其分化

现有知识传递下的旅游参与机制分析多聚焦知识精英的成长过程或特定从业群体,揭示了社区成员的学习能力与意识的非均质性。然而,此类研究往往以单一群体为分析单元,或默认社区内部为同质化整体,未能系统比较不同群体在知识获取路径、参与障碍上的分化。若要完整了解知识赋能的实际成效、参与程度的差异化表现以及参与过程

中的障碍因素等问题,必须对知识接收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现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获得认证的83名研学导师中,本地村民占比为14.45%(12人),其中,8人为初级导师,3人为中级导师,仅有1人为高级导师,12人中近半数的居民有一定的社区地位^①。

研学旅游以科学知识传递及相应产品体验为核心目标,研学旅游服务的提供依赖知识提供者对知识的系统掌握以及专业化的讲解能力。相较于传统的乡村旅游参与方式(如食宿接待、农副产品销售),参与研学旅游具有知识系统认知门槛高、收益回报周期长的特征,这要求居民需要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已有的社区参与研究从多方面探讨了影响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障碍及约束、参与制度约束、收入与地理位置的影响等^[1-2,35-36]。然而,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情境及其核心机制与本研究聚焦的“知识导向型研学旅游”社区参与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综合考量研学旅游独特性、案例地的调查发现与已有研究成果^[30,37-41],在对社区居民的各种不同属性(如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务等)及其研学参与的具体行为进行多种尝试性分类后发现,研学讲解所需的科普知识和讲解技能的获取是社区参与研学旅游的关键,社区居民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获取意愿的差别对其后续研学旅游参与情况产生根本影响。

与一般乡村旅游不同,研学旅游中的“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居民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认知、自然科学知识或文化知识的掌握及传播能力,这些能力不仅要求长期积累,也具有较高的门槛,是决定居民是否能够有效参与研学旅游的重要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居民的知识接收与应用程度。而“知识获取意愿”则不仅仅受经济收益的驱动,它还依赖居民对当地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同及其对研学旅游行业的理解,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参与决策和行动积极性。“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获取意愿”共同构成影响社区居民获得知识赋能、出现参与行为分化的基础变量。依据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获取意愿的强弱,可将丹霞山周边乡村居民研学参与

① 数据来源:韶关市丹霞科普研学实践中心. 2022年丹霞山科普研学(自然教育)导师名单[EB/OL]. [2025-01-18]. https://mp.weixin.qq.com/s/Ur_bglKv166cToOZxe7Pew; 韶关市丹霞科普研学实践中心. 2023年丹霞山科普研学(自然教育)导师名单[EB/OL]. [2025-01-18]. <https://mp.weixin.qq.com/s/syuEDBmubR08s4hfNcM5JA>.

的情况划分为4种:积极参与型、策略选择型、潜在转化型、无意无力型,相应人群分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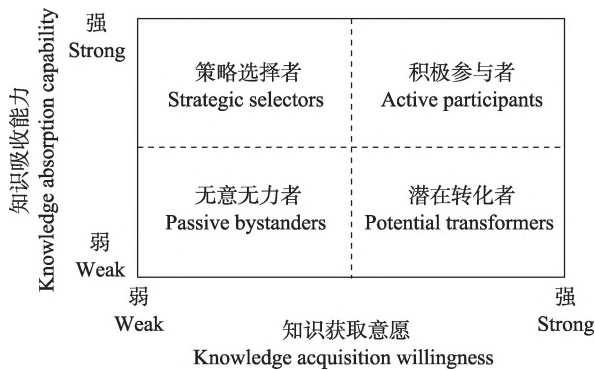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社区研学旅游参与人群分类

Fig. 1 Participant typology in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al tourism

3.2.1 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及其参与的持续强化

积极参与者(强能力强意愿)拥有较为强烈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获取意愿,自身具备知识基础、获取技能以及较强大的社会网络。他们在社区参与研学旅游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吸收并应用相关知识,成为研学参与的先锋,进而对其他居民的知识获取意愿和能力产生影响,甚至推动少部分居民由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积极参与者主要包括3类群体。

第一类积极参与者在丹霞山尚未发展研学旅游之前,就已经通过做向导、提供动植物信息等方式与众多地质学、地貌学及植物学等专家接触并习得相关的专业知识。“申遗之前,就有中大的老师过来做研究做勘测,那时候他们就会请草爷带路,因为草爷是本地的村民嘛,肯定这边哪里有某类植物啊地形啊会更熟悉,所以大学的(老师或学生)过来都会请他做本地向导。”(YXJM01)相比一般的地方向导,个别居民(即“高级导师”中唯一的村民)在此过程中往往展示出较强的专业学习兴趣,并通过与专家的交流积累自然科学知识和科普能力,使其与普通村民拉开距离。丹霞山积极推进研学旅游发展之后,这类群体参与了丹霞山研学发展全过程,并通过与高校专家的长期持续接触、积极参与培训项目和研学课程而不断构建并强化其科普知识体系,甚至能够了解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及基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我们开讲座的话,都会有村民来听,之前我也分享过最近做的关于丹霞山这边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调查。”(GXZJ01)另外,通过丹霞山管委会与研学组织的积极合作,积极参与者通过

“丹霞山科普志愿者训练营”“丹霞山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动”“科普夏令营”等培训项目和科普活动,深入学习科学知识、自然教育讲解技巧、科普服务理念与模式等研学行业知识和系统化的技能。“我们有一个丹霞山科普小镇群,管委会的、大学教授、科普达人、村民都在群里面,村民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参与研学的没参与研学的民宿主都在,有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东西,他们就会在群里问,我也会在群里问有没有人一起刷山。”(YXZZ03)

第二类积极参与者出现于2020年前后,主要由策略选择者转变而来,这一类参与者往往是社区中的管理精英,其转变动力源于双重优势的叠加。其一,由于长期接触研学机构、管委会等关键组织,因此对参与研学讲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对研学讲解本身,均持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变为科普导师之后,能够带来的住宿方面的隐性收入占目前总收入的50%,是很可观的提升。”(YXJM06)其二,在地方推行研学参与的进程中,这类群体肩负着带头示范的责任,由此成为第二类积极参与者。“大家对这个都不了解,需要有人先带头去做。”(YXJM01)

第三类积极参与者,是在前期积极参与者影响下涌现的新群体,这类居民大约于2023年出现,其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他们对研学导师制度推行和经济收益的了解。在早期转型者的示范作用下,新兴参与者对参与收益形成认知,而在研学导师认证制度标准化的激励下,触发了其积极参与的行为,获得初级导师资格(YXJM05)。然而,与早期积极参与者相比,新积极参与者尚未积累实际带团经验,其知识应用能力与资深群体存在差距,实践能力仍有待提升。

当前,随着合作的深入和经济收益的逐步显现,这3类积极参与者都是高校专家和研学机构合作的主要受益群体。高校专家与这类群体合作共同开发主题研学路径,建立高校实践合作基地,试行餐厨垃圾无废化处理等项目,通过项目合作进一步拓展了知识传递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最近和当地的科普达人合作‘无废农庄’(餐厨垃圾无废化处理)的项目,目前有3个试点……然后再结合这个做一些课程,教会自然导师怎么去讲,也可以成为研学导师科普的内容。”(GXZJ02)研学组织继续通过日常交流、科普活动等方式进行知识传递,部分积极参与者逐步转变为研学导师,从提供食宿服务的单一角色发展成为具备专业解说与旅游体验策划能力的复合型服务提供者。随着研学组织知识传

递内容的逐步丰富及其课程设计理念的创新,研学组织鼓励居民参与到课程与产品的开发中。“民宿会有各自的课程,我们会采购一些能够有互动的课程……(图书馆民宿)这边其实可以搞游客与社区互动的读书会。”(YXZZ02)为了确保研学活动的质量和规范性,管委会探索研学导师规范化成长路径,建立研学导师考核机制,并通过线下宣教、政府服务台等途径,传播研学政策,确保知识传递的有效实施。“所有课程都会通知到社区,我们做这个东西(自然教育)希望你们参加,所以我们是通过社区的科普宣教,拉动村民参与我们的工作。”(GWH01)

通过长期实践,积极参与者成为了核心知识接收者,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创新。在22位本地受访者中,有5位受访者(YXJM01、YXJM02、YXJM03、YXJM05、YXJM06)在多元知识传递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具备先锋意识的积极参与者,同时激发了其在科普教育中因地制宜的实践探索,为后续带动其他居民社区参与奠定基础,如在无人机科普课程中,科普导师在教授机器使用技巧的同时,为研学者提供了观测丹霞地貌的全新视角,而面对课程局限,居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思考调整课程。“现在课程容量比较小,大家都想体验一下无人机,但是实操下来会发现让每个人都体验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考虑要不要把这个课程调整调整。现在听说有那种模型机,在考虑要不要让大家体验飞模型机。”(YXJM06)然而,知识传递链条的不断强化,使得个别积极参与者在知识获取时长、知识积累及社会资源等方面不断增强优势,其在知识传递链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包括外地人员在内的核心导师持续性主导研学讲解服务。“现在我们合作的比较多的是几个‘明星导师’。”(YXZZ04)由此,社区内部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参与差异逐渐显现。

3.2.2 策略选择者的特征及其参与的间歇性与游移性

策略选择者(强能力弱意愿)是社区居民中具备一定知识技能并具有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但与积极参与者相比缺乏持续知识获取意愿的群体。受到个人目标、市场判断、利益诉求和感知机会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其知识获取意愿表现出一种更为审慎和自主的特点。

探索积累阶段(2014年以前),尽管策略选择者的知识获取意愿不如积极参与者强烈,但他们凭借一定的知识储备,依然能够与高校专家建立联系。

高校专家通过非正式合作方式向策略选择者传递知识,但最初策略选择者仅在有服务需求的情况下被动参与。“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但是它们的价值我们也不懂,一开始也因为他们(专家)需要村民才会去……听他们说这个植被有怎样的价值……慢慢自己也知道了,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丹霞山在研究方面还是有很大价值的。”(YXJM01)

进入研学旅游繁荣发展阶段,尽管策略选择者的知识接收意愿并不强烈,但高校专家的广泛知识传递活动同样影响着具备专业知识接收能力的策略选择者。通过线上社群、科普研学讲座、主题研学路径和高校实践合作项目等互动,策略选择者得以深化专业知识,获取行业最新动态,居民在知识积累、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同等方面获得持续支持的情况下,其知识获取意愿得到提升。在面临新发展机会的投入决策时,部分策略选择者对潜在收益进行理性判断与权衡之后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在22位本地受访者中,有两位(YXJM07、YXJM06)发生了这种转变。这一转变,将“有条件的参与”转变为更加积极、具有内在动机的参与。“一开始只是搞地质研究的教授让他(其他村民)带队,每天会给导游费,你看这就是收益,有收益之后自然就会慢慢想做了。”(YXJM01)然而,在该阶段,也有极少数策略选择者没能敏锐捕捉到研学发展的潜力,由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和动机,未能有效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或尚未将其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合适的研学参与行为,导致其参与能力逐渐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造成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失衡,逐步远离研学参与情境。在22位本地受访者中有1位受访者(QTJM14)经历了这种逐步远离的过程,失去了其在研学旅游中的活跃角色。“以前我们种的柚子比现在多也很好吃……设计点课程,放到现在也可以搞成农业研学,让孩子去体验。”(QTJM14)

2022年以来建立的研学导师制度,既规范研学活动,也为居民参与提供机会窗口。对策略选择者而言,制度的规范运行为其提供示例与典范,同时该时期各种自然教育活动,也让具备一定技能的策略选择者得以参与不定期的研学活动,借此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能力和感受研学收益的机会。“之前就有一个包粽子的活动,那专业知识型的东西需要高级导师来帮助我们,但包粽子村民都会包,就可以来帮忙。”(GWH01)制度中的激励政策使策略选择者能够直观感受到参与带来的即时经济回报与长期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其参与研学旅游的动

机。“研学导师带团队都是有补贴的,导师的等级越高,补贴就越高,初级导师大概200元一天,高级导师大概能够有500元一天。”(YXZZ03)“我们也会更愿意介绍你去住到研学导师家、科普达人家,因为它更有特色,更能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只能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激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商业经营的机会。”(GWH01)基于此,个别村民(YXJM06)进一步通过知识赋能成功获得初级导师资格。当然,也有村民由于收益评估有限以及认同感不足依然为策略选择者。“现在学生生意也不一定好做了,现在(对研学)没有到很认同的地步。”(QTJM02)

3.2.3 潜在转化者的特征及其参与的辅助性和脆弱性

潜在转化者(弱能力强意愿)居民自身对地区研学旅游发展抱有较高的兴趣和知识获取意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或资源,其参与核心部分的机会与活跃度受到限制。尽管如此,较强烈的知识获取意愿为其能力提升提供充分的内在动力,并通过知识传递不断弥补不足,激发进一步参与。“旺季大家都不缺客源,淡季客源主要是搞研学的那几户生意比较好,所以会有搞研学的想法。”(YXJM05)对潜在转化者的知识传递多发生于知识传递多元化的繁荣发展阶段和发展调整阶段。潜在转化者受其知识获取意愿的驱动,逐步成为知识传递链中的核心知识接收者,但在成功获取带团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之前,他们只能参与研学旅游的辅助环节,参与形式高度依赖旅游流量,且呈现出较高的收益脆弱性。

在繁荣发展阶段,火热的市场进一步增加了研学供给的需求,这为同样具有知识获取意愿的潜在转化者带来了大量学习和参与机会。管委会牵头搭建的线上社群和科普研学讲座,成为高校专家直接向地方居民分享科研成果的途径。“每次大学师生过来进行社会实践考察,管委会都会邀请他们开讲座,分享收获,我们在群里看到消息都会积极接龙参加。”(YXJM04)管委会与研学机构合作开展的“科普志愿者训练营”为有意愿但缺少能力的居民提供包括科普知识、服务技巧、研学认知等更实践性的知识支持,线上社群、线下互动等灵活的传递媒介构建了高参与机会的知识传递网络。相比高校专家的讲座形式,志愿者训练营学习门槛较低,内容易学、实用,循序渐进地提升潜在转化者能力。“最开始我也不懂,后来就去上了那些科普的课,慢慢地我也会讲了。”(YXJM05)多样化的交流

媒介为本地居民提供持续接触最新科研进展和科普内容的途径,促进知识常态化传播,成为居民交流学习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参与者逐步成长为知识精英后,成为社区内生的知识源。“有团队需要老师带队就会叫你一起,需要讲丹霞山基本的概况啊,然后自己擅长什么就详细讲什么,有时候村里面有感兴趣想学的,我一样会教他。”(YXJM06)积极参与者不仅具备科普知识、讲解技能,而且熟悉潜在转化者的知识基础和个人特征,能够通过日常互动、示范讲解和经验分享,将旅游服务技能和科普实践知识展示给潜在转化者。潜在转化者通过与积极参与者的互动逐步融入社区研学活动,居民角色的转换连续、自然。“需要志愿者帮忙的时候我就会过去,在过程中我们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带队的。”(QTJM20)

梳理知识传递路径发现,潜在转化者是知识传递网络中接收传递链条最多的群体,并能获得系统化、结构化的支持。开放态度和多样化的知识传递途径为他们提供了转型的机会,有效利用多路径知识传递渠道,能够促成知识传递和资源流动^[23]。“本地参加的人基本上是自己对自然感兴趣的,愿意尝试改变的人。”(YXJM01)然而,尽管知识传递为潜在转化者提供了转型的可能性,但个体的成功转型还受到个人能力、行业发展以及社区支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此,在转型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潜在转化者中更为积极的居民,能力趋向专业化,能够担任专业解说员等核心角色。22位本地居民受访者中有1位(YXJM05)实现了从边缘参与向核心参与的转变。“现在发展研学还是政策的大方向,而且我看那些搞科普学堂的他们就生意相对好点,他们考了研学导师证还会有一些补贴,看到他们搞得不错,我就也把我这个宾馆搞成科普的,就去参加了培训,考了研学导师证。”(YXJM05)二是另一部分居民由于持续面临参与困境,未能实现转型,甚至可能退出,转为无意无力者(如QTJM12、QTJM13)。

3.2.4 无意无力者的特征及其在知识赋能过程中的边缘性

无意无力者(弱能力弱意愿)居民的知识获取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对研学旅游发展缺乏足够的兴趣或了解,或因家庭、农业生产等其他优先事项占用主要精力,影响对研学的参与度。由此,这类居民在知识传递过程中发生知识传

递链条断裂问题,导致其在知识传递过程中长期处于外围位置。

随着积极参与者的经济回报和职业发展机会显现,此类居民在社区氛围感染、实际收益展示、低门槛参与机会和榜样作用等因素的推动下,知识获取意愿逐步提高并开始参与到高校讲座、植物辨认等研学活动当中。“他们家搞研学收入不错,人一多我们也有收入,我也想参与研学旅游。”(QTJM20)同时,积极参与者作为社区内部的行动者,天然具备与无意无力者接触的条件,他们通过日常的非正式交流与协作展示参与研学带来的成就、生活改善和社会认同,激发无意无力者的好奇心和参与欲望。“有时候他们民宿住不下的就可以分到我们这里来住,也算是从研学旅游中分到一点收益了。”(QTJM20)“草爷辨认植物很厉害,每次大学教授来都会请他做导游,现在他们还合作发了文章。”(YXJM01)因此,无意无力者往往会先转变为潜在转化者。访谈中,3位受访者(QTJM20、QTJM21、QTJM09)随着对研学活动兴趣和信任的逐步累积,逐渐考虑更加深入的参与。“天天看到就研学的游客最多,看到旁边做研学的他们生意好了,那我们肯定有想法做研学旅游。”(QTJM09)

知识吸收能力需要长期实践积累,而知识获取意愿能够通过感知研学发展氛围受到影响,无意无力者向潜在转化者的转变为丹霞山研学旅游培养了更多社区参与者,但提升知识吸收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向无意无力者的知识传递仍然处于广泛知识传递阶段,传递情境较为被动,传递媒介缺少针对性。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传递链条,针对无意无力者的知识传递链条较为脆弱,这可能导致社区内知识传递成效的两极分化。对社区内部各类行动者的知识接收及其类型转变的总结如表2所示。

4 参与困境的形成原因

依据上述对多知识传递链条的梳理,可以发现4种参与类型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并逐步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在结构中,位于金字塔上端且人数相对较少的是积极参与者和潜在转化者。积极参与者已融入研学旅游的各项活动,成为社区发展和知识传递的核心力量,潜在转化者虽然在知识基础、技能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虽参与程度有限,但积极的意愿依然能够使其与知识传递过程

紧密联系。而位于金字塔下端的则为策略选择者和无意无力者。策略选择者由于缺乏知识获取意愿,传递强度逐渐减弱,未能融入核心研学旅游活动。无意无力者则由于缺乏必要的意愿与能力,仍然处于社区参与的外围位置。与传统的食宿接待与农业活动相比,研学旅游作为新兴知识型行业,能够为参与者带来相对更高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回报。然而,当前的参与障碍使得居民未能突破现有瓶颈进入这一有利领域,导致部分居民无法分享研学旅游带来的经济社会收益,加剧了社区内部的贫富差距。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居民参与研学的障碍。图2总结了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4.1 市场规模局限与产品深度开发不足

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一旦市场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扩展,带来的则是市场中可分配的资源相对有限。丹霞山研学旅游市场规模受到市场自身特性、产品联动、外部力量多方面共同影响。当前,丹霞山的观光游览仍为核心旅游产品,尽管研学旅游得益于自然科学价值、国家政策支持 and 景区转型需求,已取得一定突破,但研学市场的需求仍显不足,且整体占比较小。“研学旅游的人数占来丹霞山旅游的人中的1/10左右……现在研学市场有点饱和,以前可能真的是供不应求,现在是绝对供大于求。”(WLRK17)市场规模的限制,使得具备较强意愿和能力的个体在资源分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这种市场“饱和”只是表象,实际问题是产品创新与深度开发的不足,导致市场的封闭性和单一性。目前,大多研学产品停留在与观光旅游相结合的初级阶段,深度互动和实践环节设计不足。“他们来研学平时基本上每天一早就拉去上山,爬爬山介绍一下就回来,其他的活动很少。”(WLRK12)“目前在产品设计这一块我也很难去突破,大家在这个圈子里已经被固化了。”(YXZZ04)由此,导致市场的参与度受限,潜在的观光游客难以转化为研学旅游的有效参与者,市场规模与产品深度开发的不足成为4类群体共同的参与困境。实际上,丹霞山仍有可能通过深化研学产品设计、丰富体验环节和增强市场联动性来突破这一局限。

4.2 现有资源分配路径的固化

研学带团讲解机会可以视为一种资源,通过对

表2 社区内部行动者类型划分与边界及知识传递路径总结
 Tab. 2 Internal community actor categorization, boundarie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pathways summary

知识接收者 Knowledge recipient	知识源 Knowledge source	行为表现 Behavior	意向表述 Intention	划分特征 Typological criteria				知识接收者 Recipient status		现存转变 Transition	
				吸收能力 Capability	获取意愿 Willingness	渠道接触度 Channel exposure	知识内容 Content	时间维度 Time	转变因素 Factors	转变结果 Outcomes	类型转变表现 transfer manifestation
积极参与者 Active participants	高校专家 研学组织 管委会	-获得研学导师认证 -完成过带团讲解 -参与课程设计 -参与专家讲座	-表明具有长期参与意愿 -认同研学发展路径与价值	高	高	多元	深入、系统专业、创新	长期持续	持续受益	目前未出现向其他类型转变的情况	-
策略选择者 Strategic selectors	高校专家 管委会	-间歇性参与研学或曾经参与辅助工作	-当前对研学旅游前景保持中立态度	高	低	有限	实用、应用经济、资源	间歇断续	逐步分化	意愿提升能力匹配	获得研学导师认证、系统性学习行为出现、收入依赖增加
潜在转化者 Potential transformers	高校专家 研学组织 管委会 积极参与者	-未获得研学导师认证但参与过相关志愿活动 -不定期参与科普讲座 -进行研学活动辅助工作	-表明强烈的参与意愿 -认同研学发展路径与价值	低	高	广泛	基础、简明引导、实用	短期持续	持续受益	能力提升	无意无力者 积极参与者
无意无力者 Passive bystanders	管委会 积极参与者	-从未参与任何研学活动 -未主动了解过研学相关信息	-对参与研学持有中立或拒绝的态度	低	低	外围	普及、基础激励、感知	短期持续	边缘化	能力不足意愿下降 意愿提升 维持弱态	无意无力者 潜在转化者 无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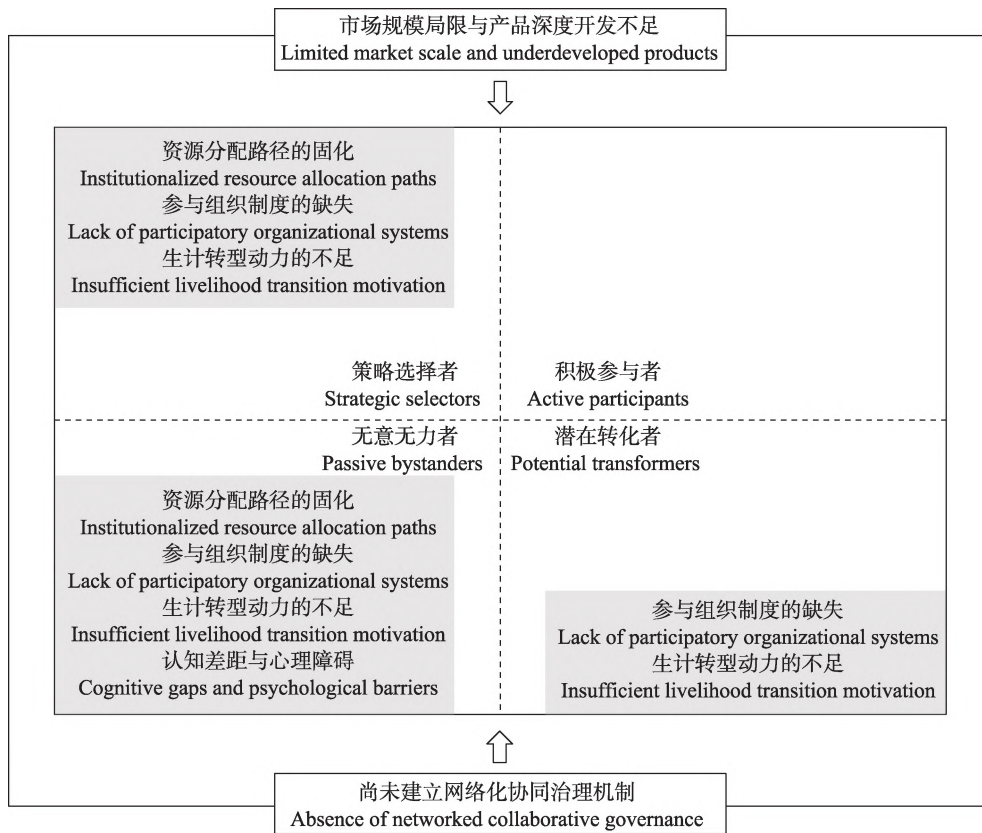


图 2 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的影响因素差异

Fig. 2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dilemmas

现有研学带团资源分配路径的梳理,可以识别出本地居民主要的4种资源获取方式。第一,基于政治身份的资源获取。社区中的政治精英凭借其对乡村发展状况的深入了解,成为特定类型的导师,进而获得相应讲解机会。“现在我也是研学导师,他们把我分到乡村振兴类,你们来就可以给你们讲整个村的发展过程。”(YXJM01)第二,基于专业角色转变的资源获取。居民在获得研学导师认证后,激活制度性资源渠道,获得直接对接研学项目的路径。其开设课程直接通过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同时,也加入研学核心群体内的研学服务资源协同机制中,相关机构会优先选择具备资质的本地居民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也会更愿意介绍你住研学导师家、科普达人家,因为它更有特色,更能提供优质服务。”(GWH01)第三,基于亲缘关系的资源接触。居民因亲属在研学领域关键机构(如管委会或研学中心)任职,形成信息获取与资源分配的优先通道。这种优势体现在对行业动态的早期掌握,以及通过亲属引荐获得参与研学服务的机会。“我们家资源多,说实话,也有家里人在中心上班、离资源更近的原因,很多消息我们也会知道得早一些。”(YXJM06)

“主要还是他们(亲戚)带着一起,有时候研学团人太多的话需要志愿者帮忙,会喊我去。”(QTJM20)第四,基于经济合作的资源分享,主要表现为外部经济资本通过与拥有研学资源的角色或机构进行经济合作,分享研学旅游经济收益,进一步获取资源。然而,当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或制度化支持时,上述路径会出现固化倾向,早期进入者通过积累形成优势。“现在做得好的都是开始得早的那些,现在我们想做,资源沾边都沾不到。”(QTJM13)而研学外围群体(如策略选择者、无意无力者)难以突破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资源渠道,抑制了知识获取意愿,固化的资源分配路径使得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难以突破既有的困境,进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获取和社会融入。

这种分化在外来研学导师介入后进一步加剧,外来研学导师基于对行业潜力判断、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资本支持,在进行研学投资和开发时更具针对性和效率,并在市场分析、项目规划、资源整合方面相较本地居民更具有优势,尚未建立本地优先机制的情况下,他们能够获取更多资源占住大部分市场,成为本地居民无法进行有效竞争而被边缘化的

潜在因素。“现在接触研学的外地人比本地人多……他们(外地人)还去学习的话,就更有优势了,见识也会多点。”(YXJM05)“(顾客)现在很多都是以前合作过的,就一直会过来我这边住。”(WLRK12)有限的市场让持续受益群体能够凭借已有优势(如资本、人脉、经验等),形成长期合作,俘获更多研学资源。而研学外围群体如果没有能够参与产品创新或跨界合作中,很难突破市场的局限,进一步被排除在外。

4.3 参与组织制度的缺失

居民知识吸收能力从弱到强的变化,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机制来推动其逐步提升,并确保其能够在能力范围内有效参与。现有“科普志愿者-科普研学导师-科普达人”的科普人才成长路径,虽然为居民参与研学旅游提供了一定的系统化支持,但难以确保不同能力的居民在逐步提升过程中,获得“实际参与”支持:新晋导师因初期经验不足难以获得核心讲解机会,而实训机制缺失又制约其能力提升,形成参与瓶颈。尽管在积极参与者的影响下,社区内部已经形成知识传递“外部输入-内部扩散”的模式,衍生出“氛围感知→活动体验→志愿参与→资质获取”的渐进参与路径,但仍由于缺乏规范化的保障,导致居民参与的中断与停滞。“带徒弟没有规定的要求和形式,你不主动就没办法。”(YXZZ05)“一开始参与的多,但很多人基本就没有坚持下来,没人带你很多东西搞不定的。”(QTJM09)现有机制未能充分适配不同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的能力短板,对于那些缺乏相关经验(如潜在转化者)或资源的研学外围群体(无意无力者、策略参与者)而言,支持引导的断层导致参与路径的固化与停滞。

4.4 生计转型动力的不足

生计优先是居民选择是否参与研学旅游的决定性因素,多数丹霞山本地居民前期通过农产品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并通过这些经济活动积累了初步的财富,进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居住条件。对于这部分生活较为稳定的居民而言,维持现有生计,继续通过经营民宿、提供餐饮服务等方式保持经济稳定是核心,因而缺乏主动寻求生计转型的动力。“我们现在就做好餐饮就可以了,不去想那么多。”(QTJM12)“现在这样的生活就挺好的(以收租为主),就不想接触那些了。”(QTJM10)尽管部分居民有转型的意愿,但经营民宿已占据大量时间精力,导致其难以参与培训学

习。“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精力搞这些(研学旅游),做好住房就可以了。”(QTJM13)在面对需要较高知识储备和能力提升的研学旅游行业时,如无意无力者和策略选择者出于对现有生计状态的满足,缺乏转型动力,同样即使是潜在转化者这样具有“知识获取意愿”的群体,也可能因为有限的精力使得他们没有及时抓住行业中的新机会,进而导致其参与停滞,加剧了研学外围群体与研学旅游领域之间的隔离与排斥。

4.5 认知差距与心理障碍

研学旅游行业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支持,持续受益群体往往在教育背景、信息获取和知识体系上占据优势,能够更快适应行业需求并提升自身能力。然而,研学外围群体(如无意无力者)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或缺乏专业培训,难以理解和掌握行业相关知识,从而在参与过程中面临较大的能力障碍。“我去听过一两次讲座,听不懂那些太专业的东西,后来就没去了。”(QTJM02)尽管认知差异可以通过有效的知识传递和培训逐步缩小,但由此引发的心理因素则成为难以进行实际行动的最大阻碍,多数居民常常因年龄、文化背景及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并对新知识产生排斥情绪。“现在年龄大了,那些东西学不来。”(QYJM11)“我们没有那么多文化,不想搞那些东西(科普研学)。”(QTJM14)认知差距与心理障碍逐渐在参与过程中互相强化,形成自我限制的负向循环,难以有效突破,研学外围群体在资源获取和行业适应方面的劣势愈加明显,他们与持续受益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4.6 尚未建立网络化协同治理机制

纵观丹霞山发展历程,管委会无疑是推动地区进行科普转型的核心力量。尽管管委会通过科普转型积极促进了研学旅游的发展,但其主要职能集中在对丹霞山地区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并未涉及对社区发展的直接管理与调控,尚未建立起网络化协同治理机制。不可否认,科普转型带来的收益一定程度上能够辐射到社区层面。“我们没有文旅发展、社区管理的职能,只能说我们通过科普溢出效应,涵盖到了社区服务……通过科普宣教拉动村民参加我们的工作。”(GWH01)但通过溢出效应带来的影响通常是渐进的、间接的,经济条件较差或社会资源匮乏的居民往往难以感知和利用间接效益。

在此情境下,若政府的介入仅依赖溢出效应,而缺乏激励措施和政策支持,景区与社区发展的协同性治理缺失,便难以有效激发社区居民,尤其是研学外围群体(无意无力者、策略参与者)的知识获取意愿。在此背景下,研学外围群体需要具备较强的自我驱动能力才能积极参与研学旅游项目,这无疑提高了居民参与的门槛。

5 总结与展望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广东丹霞山为例,系统梳理了多种知识行动者向乡村居民进行的知识传递过程,并探讨了这一过程中乡村居民研学参与类型的分化及其参与障碍(图3),得到以下结论。

1)知识获取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作为划分维度,能有效应用于乡村居民研学参与的类型划分,为分析研学参与在乡村旅游社区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基础。依据这两个维度,乡村居民可被划分为4种类型:积极参与者(意愿强能力强)、策略选择者(意愿弱能力强)、潜在转化者(意愿强能力弱)以及无意无力者(意愿弱能力弱)。4类群体中,积极参与者相较其他群体更可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能够更好地依靠社会网络和以往的资源积累进入研学市场,并获得相应收益,其他3类居民在研学参与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困境。因此,整体上看,研学参与作为一种社区参与的新类型、新机制,有可能会只扩大优势地位者的收益途径,未起到促进均衡发展作用的结果。当然,通过类型分析也可发现,只要社区形成良好的知识传播氛围,非核心参与者始终拥有获取知识赋能的机会,其研学参与的路径并未断绝。

2)4类居民所获得的知识赋能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积极参与者往往能够凭借较强的知识获取意愿和能力成为知识获取路径中的核心节点,形成“经验积累-技能标准化-知识生产实践”的螺旋式发展路径,并呈现出多样化、有序化的特征,成为收益最多的群体。策略选择者低意愿的特征使其参与行为依赖外部激励,知识获取路径呈现碎片化特征,在知识内化与创新能力方面出现持续弱化的可能。潜在转化者以高意愿作为驱动力,知识获取路径可能呈现出“外围感知→实践参与”的渐进式特征,但转型仍受限于个人能力和参与支持,知识获取存在一定脆弱性。无意无力者由于较低的知识

接收意愿与能力,知识获取路径被动且单一,仅通过浅层社区信息感知形成认知,难以从知识传递的外围地位向核心靠近。需要予以澄清的是,研学参与的外围群体并不一定是社区生活的弱势者,此类居民完全可以通过民宿、餐饮等传统旅游参与获得稳定收入。由此,社区研学参与可能出现如下局面:积极参与者因持续受益保持核心地位;潜在转化者也在知识传递过程中通过能力提升,进入核心圈层;策略选择者在能力与意愿动态匹配中呈现分化趋势,一部分转化为积极参与者,另一部分则因获取意愿衰减与能力退化而转变为无意无力者;而无意无力者则因能力不足和渠道脆弱性逐渐脱离知识传递体系,逐步远离研学旅游的相关活动。

3)研学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社区参与机会,尽管为部分群体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但现有知识传递过程可能进一步扩大研学参与过程中持续受益居民与其他居民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之间的分化源于多重参与障碍。首先,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及产品开发的不足导致研学旅游资源竞争加剧,具备较强意愿和能力的群体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外围群体难以突破这一瓶颈,无法参与到市场的核心圈层。其次,现有资源分配因政治身份、专业资质、亲缘关系和经济资本形成固化,早期进入者形成资源获取壁垒,外部从业者的加入进一步“挤压”本地居民空间,有限市场规模与先发优势的交互作用,导致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持续强化。再者,缺乏有效的参与制度性支持体系,居民参与缺乏实践衔接机制,不同能力层次的居民未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传递与技能提升,处于外围位置的居民易因引导断层而导致参与中断。同时,生计转型动力不足与认知心理障碍加剧参与停滞,因居民对现有生活状况的满足不愿投入长期转型成本,知识排斥与自我怀疑进一步加剧了其研学旅游行业之间的隔阂。最后,政府政策和社区发展的协同治理缺位,无法有效激发群体的知识获取意愿。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3个方面。

1)已有研究指出,拥有的旅游相关知识是地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工具^[5,26,37],知识在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和促进社区参与中具有核心作用^[8,42-43],本研究则更进一步从知识传递的异质性切入,通过“知识获取意愿-知识吸收能力”二维框架细分居民参与类型,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居民知识传递参与过程,由此明晰了参与者在知识传递中的收益差异,指出了:研学参与若无长期知识积累则无法进入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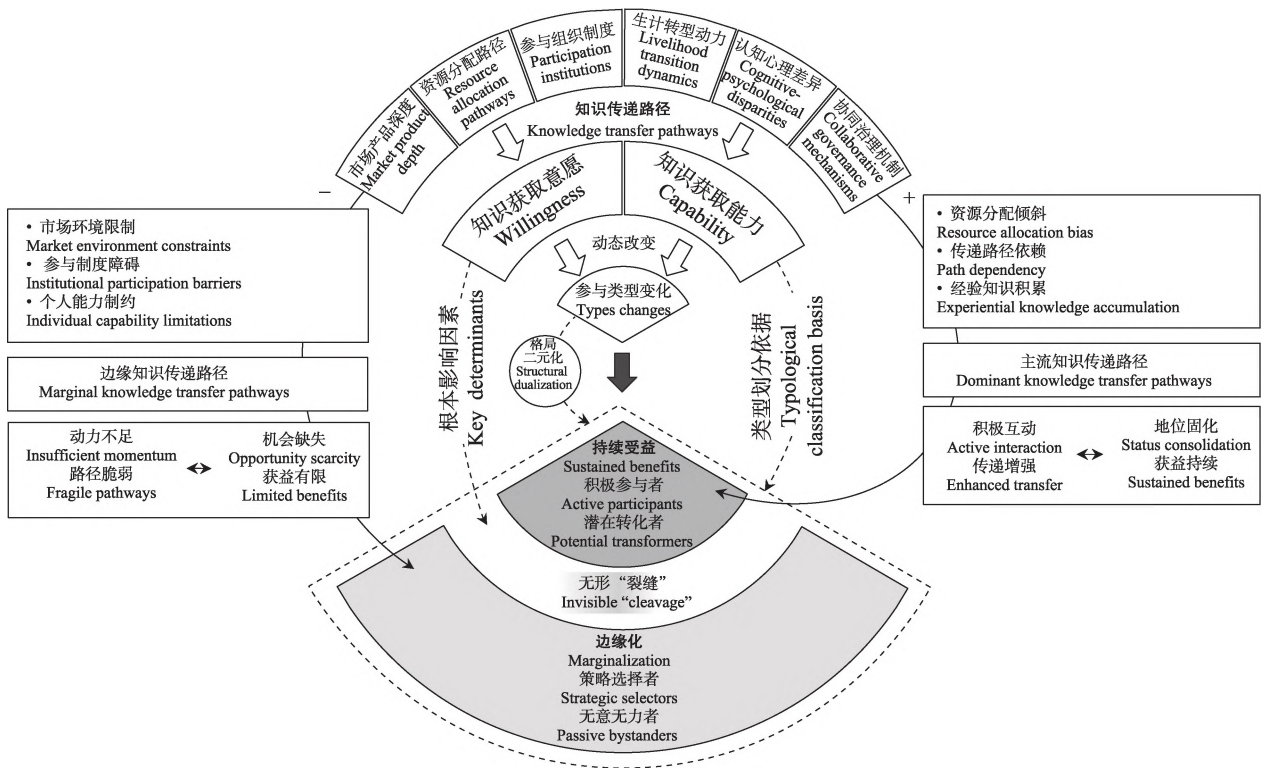


图3 社区居民参与差异形成机制

Fig. 3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participation differentiation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心圈层,若无持续学习动机则难以维系参与韧性的特征。在研究乡村地区的社区参与中,群体异质性不容忽视,能力决定参与深度,意愿驱动参与韧性,二者共同构成影响社区居民获得知识赋能、出现参与行为分化的基础变量。该模型可迁移至其他需专业知识赋能的乡村旅游场景,为乡村旅游地的知识传递差异提供分析视角,进而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社区参与研究提供了参考。

2)研究揭示了社区参与知识赋能过程中存在的路径差异与动态转变机制,解构知识赋能的“黑箱”,突破已有研究对这一过程的单一解读^[5,22,26-28],并找出转化的可能条件包括社区氛围、知识接收渠道等要素的协同作用,深化了对知识赋能过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Albino等^[11]的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刻画知识传递赋能的过程,在探究知识赋能差异与动态转换时,应从参与者异质性出发,分析知识传递过程中异质性变化过程,为理解知识赋能的非线性演进提供分析视角。

3)指出了乡村居民的研学旅游参与障碍和困境,为探究突破困境的出路提供了基础。当前,许多如丹霞山一样具有自然和人文价值的旅游目的地正迅速向科普研学地转型,也成为研学产品特色文化的支撑^[44]。这一转型推动了旅游产品多样化,

激发了市场活力,成为社区居民深入参与旅游的窗口。然而,在很多乡村旅游地,尽管现有制度框架为居民提供了一定的参与机会,但在制度仍有不足的背景,有限市场规模与先发优势的交互作用,往往导致知识资源传递呈现路径依赖,“马太效应”持续强化。本研究所指出的参与困境为困境的突破、出路的寻找指明了方向。

5.2 实践与管理启示

解决乡村居民的研学参与障碍,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政策创新、资源分配机制改革以及针对性支持体系的建立,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参与路径,促进社会资源的更加均衡的分配。首先,需要以市场创新和产品体系构建为抓手,合理扩展现有市场规模,扩大社区参与空间。通过创新开发融合当地特色资源的深度体验型产品,构建从初级到高级、从大众化到个性化的研学旅游产品体系,在扩展市场的同时为居民提供差异化研学参与机会。以丹霞山为例,激发研学旅游市场潜力是关键,相关管理者可创新开发融合农耕生产、新农项目的沉浸式研学产品,如突破简单的中草药种植和辨认,开发面向深度体验的老药农亲自带游客上山寻找和采摘中草药等形式定制化产品;对于获得研学导师资格但

尚未有机会真正带团的居民(如潜在转化者),可延请其在景区内适合人工讲解科普知识的地方进行定点解说并予以适当奖励,以此提高观光游客的旅游体验并促进观光游客向研学游客转变。通过此类措施,可逐渐构建完整研学产品谱系,扩大市场规模,为不同类型的居民提供差异化参与机会,提升居民参与的普惠性,特别是帮助潜在转化者和策略选择者进入核心圈层。其次,需要完善研学参与制度^[45],打通知识传递“外部-内部、内部-内部”全通道,创新知识传递体系,优化参与激励机制,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培训制度,如通过实施更加个性化的“一对一”导师扶持机制^[5]、创设“科普助教”过渡岗位、建立制度化的“传帮带”体系,持续进行经验传递,并依据社区居民培训参与和实践的情况和阶段,以培训津贴、实践补贴或游客资源支持的方式提供阶段性奖励,增强积极参与者和潜在转化者的持续参与的动力,增加对策略选择者和无意无力者的参与吸引力。再者,面对资源分配困境,一方面可以采取更加透明的分配机制,如建立合理的资源申请和分配制度,结合项目支持等手段,打破资源获取壁垒,平衡各主体的资源获取;另一方面,在确保游客体验和外来导师合理权益的基础上,适度建立并实施本地优先机制或本地保护机制,如在一定规模的研学活动中,规定本地居民的参与比例,平衡外部资本与本地居民之间的资源分配差异,解决策略选择型和无意无力型群体由于外部资源壁垒导致的参与难题。此外,建立基于社区差异性的精准支持路径,通过入户走访、社区会议等方式加强与居民的联系,评估未参与居民的生活现状、意愿和能力水平,以居民的参与意愿、经济基础、能力水平等差异性为依据,识别潜在转化者与无意无力者,并收集其参与障碍,针对性地调整培训、补贴制度。例如,对于存在经济顾虑的居民,提供定向补贴;对已参与的居民,依据经营盈利情况,及时提供运营、渠道拓展等支持。最后,在已有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网络化协同治理机制,保证多部门及多层级主体在景区保护开发与社区发展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和联动,将相关部门职能明确化,科学界定社区与景区的责任和利益分配方式。这一系列措施将为优化参与机制、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5.3 研究展望

本文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探讨了乡村居民研

学参与过程中的路径差异和动态转变,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加强对定量数据的收集,并通过长期跟踪调查获取居民参与研学旅游的收益变化,同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知识传递效率,并探索传递效率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选取的案例地以自然生态研学为主,未来可拓展至多案例对比研究,选取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以及文化情境差异显著的研学旅游地,分析不同旅游地群体知识赋能路径差异,以及参与障碍的共性与特性,进一步探索本文结论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为不同地区的研学参与和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TOSUN C.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13-633.
- [2] 翁时秀, 彭华. 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9): 51-57. [WENG Shixiu, PENG Hua. The impact of power relationship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A case from Furong village at Nanxi River Basin, Zhejiang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9): 51-57.]
- [3]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2): 245-249.
- [4] DUSHKOVA D, IVLIEVA O. Empowering communities to act for a change: A review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gram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J]. *Sustainability*, 2024, 16(19): 8700.
- [5] RAO Y, XIE J, XU X. Facilitating “migrant-local”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4, 100: 104836.
- [6] DUN O, KLOCKER N, HEAD L. Recognising knowledge transfers in ‘unskilled’ and ‘low-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ights from Pacific island seasonal workers in rural Australia[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2018, 59(3): 1-17.
- [7] 张睿, 姬长旭.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职业农民知识转移演进过程研究——基于广西龙脊梯田景区的纵向单案例研究[J]. *旅游科学*, 2022, 36(1): 50-72. [ZHANG Rui, JI Changxu.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of rural tourism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ethnic areas: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Longji Terrace Scenic Spot Area in Guangxi[J]. *Tourism Science*, 2022, 36(1): 50-72.]
- [8] 周波, 叶顺. 以知识转移促进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产业与人才双振兴[J]. *旅游学刊*, 2021, 36(4): 12-13. [ZHOU Bo, YE Shun. Promoting the dua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talent in the post - poverty - alleviation era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4): 12-13.]
- [9] 李贵清, 解佳, 刘俊. 知识导向型社区旅游中知识精英成长机

- 制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1): 109-121. [LI Guiqing, XIE Jia, LIU Jun.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elites'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oriented community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1): 109-121.]
- [10] HARDY A, VOROBOVAS-PINTA O, ECCLESTON R. Enhanc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 tourism: An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approach[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37: 33-41.
- [11] ALBINO V, GARAVELLI A C, SCHIUMA 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role of the leader firm[J]. *Technovation*, 1998, 19(1): 53-63.
- [12] INKPEN A C, WORK S E W K T.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and knowledge transfer[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1): 146-165.
- [13] RAISI H, BAGGIO R, BARRATT-PUGH L, et al. A network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0: 102817.
- [14] VALERI M, BAGGIO R.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an Italian tourism system: A network approach[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2, 25(13): 2127-2142.
- [15] MCLEOD M, VAUGHAN D R, EDWARDS J, et al.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in open networks of tourism busines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2, 36(2): 438-456.
- [16] BAGGIO R, COOPER C. Knowledge transfer in a tourism destination: the effects of a network structure[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10, 30(10): 1757-1771.
- [17] DEL CHIAPPA G, BAGGIO R. Knowledge transfer in 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a network structure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4 (3): 145-150.
- [18] 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1): 14-37.
- [19] GILBERT M, CORDEY-HAYES M.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Technovation*, 1996, 16(6): 301-312.
- [20] SZULANSKI G.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27-43.
- [21] 乔萌. 乡村旅游地外来经营者向本地居民知识转移的过程与影响机制研究——以莫干山镇仙潭村为例[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QIAO Meng.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External Operators to Local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Areas—A Case Study of Xiantan Village in Moganshan*[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3.]
- [22] 李贵清, 刘俊, 解佳. 协调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新路径: 基于知识转移视角[J]. 旅游科学, 2023, 37(6): 24-41. [LI Guiqing, LIU Jun, XIE Jia. A new way to coordinate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tected nat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er[J]. *Tourism Science*, 2023, 37(6): 24-41.]
- [23] NOVELLI M, SCHMITZ B, SPENCER T. Networks,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A UK experie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141-1152.
- [24] LONGART P, WICKENS E, OCAÑA W, et al. A stakeholder analysis of a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n ecuadorian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Education*, 2017, 20: 87-100.
- [25] HAWKINS D E. Transferring tourism knowledge[J].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2006, 7(1-2): 13-27.
- [26] NGO T, PHAM T. Indigenous residents, tourism knowledge exchange and situated perceptions of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3, 31(2): 597-614.
- [27] 饶勇, 杨岳轩, 林雪琼等. 旅游扶贫中的“外来劳动者-本地贫困人口”知识转移[J]. 旅游学刊, 2018, 33(12): 26-35. [RAO Yong, YANG Yuexuan, LIN Xueqiong, et al.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migrant workers to the impoverished local population in pro-poor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12): 26-35.]
- [28] 朱璇. 新农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6): 73-78. [ZHU Xuan. A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and acting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conomic elites in rural touris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iger Leaping George Hiking Route in Yunnan, China [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6): 73-78.]
- [29] 孙静敏, 郭凌. 商业关系嵌入和知识转移与乡村旅游地居民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8(1): 87-94. [SUN Jingmin, GUO L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relationship embedd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8(1): 87-94.]
- [30] 郭华, 陈丽如, 马文秀. 乡村旅游小微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4): 52-65. [GUO Hua, CHEN Liru, MA Wenxiu. Dynamic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knowledge transfer among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rural tourism: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 (4): 52-65.]
- [31] KOCH E. *Reality or Rhetoric? Ecotourism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 Africa*[M].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94: 44-48.
- [32] 刘法建, 郭宗坤, 宫瑞杰等. 区域创新活跃度影响下的乡村住宿企业创新策略与成长差异——基于代理人模型的仿真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4, 39(9): 62-76. [LIU Fajian, GUO Zongkun, GONG Ruijie, et al.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ctivity on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growth of rural accommodation enterprises: A simulation study based on agent-based modeling [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9): 62-76.]
- [33] 翁时秀, 彭华. 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J]. 地理科学, 2011, 31 (3): 372-377. [WENG Shixiu, PENG Hua. Impact of behaviors of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 on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changing: A perspective of na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3): 372-377.]

- [34] 吴志才, 熊娇.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 的经验数据[J]. 旅游学刊, 2024, 39(8): 156-168. [WU Zhicai, XIONG Jiao. Impact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income mobility of farm households: Using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8): 156-168.]
- [35] 杨效忠, 张捷, 唐文跃等. 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及影响因素——西递、宏村、南屏比较研究[J]. 地理科学, 2008(3): 445-451. [YANG Xiaozhong, ZHANG Jie, TANG Wenyue, et al. Level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cient village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Xidi, Hongcun and Nanp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3): 445-451.]
- [36] 保继刚, 孙九霞. 雨崩村社区旅游: 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 旅游论坛, 2008(4): 58-65. [BAO Jigang, SUN Jiuxia.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Yubeng village: Means of particip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mpowerment[J]. *Tourism Forum*, 2008(4): 58-65.]
- [37] RASOOLIMANESH S 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sit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8: 142-153.
- [38] ALKATHIRI N A. Determinants of knowledge transfer: Expatriate competencies and local staff absorptive capacity[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3, 15: 14360-14378.
- [39] HUNG K, SIRAKAYA-TURK E, INGRAM L J. Testing the efficacy of 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3): 276-288.
- [40] CAVALLARI M. The determinant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study of a refined model[M]//SPAGNOLETTI P.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Working and Living Together in New Ways*. Berli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257-265.
- [41] SHARPLEY R, TELFER D.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Issues*[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2: 3-30.
- [42] JOO D, WOOSNAM K M, STRZELECKA M, et al. Knowledge, empowerment, and action: Testing the empowerment theory in a tourism contex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28(1): 69-85.
- [43] 苏明明, 杨伦, 何思源.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路径[J]. 旅游学刊, 2022, 37(6): 9-11. [SU Mingming, YANG Lun, HE Siyua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he pathway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6): 9-11.]
- [44] 谢春山, 张金洋. 研学旅游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优化研究[J]. 旅游研究, 2021, 13(1): 1-13. [XIE Chunshan, ZHANG Jinyang. Study on the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of research tourism[J]. *Tourism Research*, 2021, 13(1): 1-13.]
- [45] 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1): 48-70.

Knowledge-based Capabilities and Participation Limitations: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Tourism

WANG Mingmeng, WENG Shixiu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 vital vehicle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sation, offering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foster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context, educational tourism has emerged as a distinctive mode of engagement that enables loc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not only as service providers but also as knowledge agents. However,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rural residents engage with educational tourism remain varied and unev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iated forms of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examining how willingness, capability,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interact to shape engagement outcomes.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Danxia Mountain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this research employs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residents' knowledge empowerment trajectori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Findings reveal a four-part typology based on the intersection of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1) Active participants—residents with strong willingness and high capacity, often situated at the centre of loc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structured learning and tourism activities; 2) Strategic selectors—residents with high capability but limited willingness, whose participation is often driven by external incentives and may shift over time depending on perceived benefits; 3) Potential transformers—

willing individuals with limited capacity, whose engagement remains fragile due to lack of training, support, or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4) Passive bystanders—residents with low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ten marginalised in community initiatives and reliant on peripher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barriers that reinforce participation disparities and limit upward mobility across typological categories. These include restricted market opportunities, the accumulation of advantage among early adopters (first-mover effects), gaps i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raining and mentorship, and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policy frameworks and grassroo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such as low self-efficacy and risk aversion, further exacerbate disengagement. Without sustained support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educational tourism risks reproducing inequality rather than serving as a platform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a two-dimensional typ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residents' knowledge absorption willingness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capability, this study offers a nuanced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transition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ithin community-based tourism participation. It unpacks the “black box” of knowledge empowerment, revealing how learning pathways, participation trajectories, and role transformations are mediated by both internal motivations and external systems.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multi-level policy innovation, equitabl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context-sensitive support mechanisms to enhance community inclusion. Educational tourism, if not coupled with sustained knowledge-building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may fail to integrate residents into the core of tourism networks and undermine long-term participatory resilienc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tourism by illuminating the differentiated, dynamic, and multi-scalar nature of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t moves beyond homogenised view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by offering a nuanced typological framework that captures the heterogeneity 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ies to engage in tourism-relate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is framework, the study reveals how individuals occupy and tran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participatory roles—ranging from active participants to passive bystanders—based on shifting internal motivations, evolving capabilities, and changing external condition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market structures.

Keywords: educational tourism; knowledge transf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limitation

[责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